

生态法西斯主义（上）：法西斯的生态往事，生态学的麻烦历史

蒋亦凡

2019-05-29 16:54

按：近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气候和环境议题占据了选战的焦点。选举前的民调显示，气候与环保议题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安全与移民问题，成为了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这被认为是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流失选票而德国绿党一路飙升成为最大赢家的原因。不过生态问题并不向来是左翼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从最近发生的新西兰清真寺恐袭案凶手发表的宣言《大替换》，到两年前“另类右翼”一词的缔造者、白人至上主义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维尔“联合右翼”集会期间发布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寻到生态议题的线索。事实上，生态学在二十世纪就有着一段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的历史，它在法西斯主义“血与土”的逻辑下，成为了反移民的帮凶——普通民众在生态话语的鼓励下，开始相信无根的外来民族（犹太人）会破坏本土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而“生态法西斯主义”也并未随着纳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续回响在后来的很多运动之中。如《生态法西斯》一书的作者指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只有“生态”取向却没有社会批判意识，那么它将是十分不稳定的。而一种解放性的生态政治需要对古典生态法西斯主义及其当代延续性有敏锐的意识。这个意识也一再提醒着活跃于今天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农业运动——拒绝法西斯主义的渗透！

2019年3月15日的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清真寺枪击事件震惊世界。袭击者准备周密，对这场造成50人死亡的屠杀进行在线直播，在事前还发布了一份长篇“宣言”，号召以武力反抗针对白人的“人口替换”，并在其中自称“生态法西斯主义者”。这个标签令人困惑。当“法西斯”早已成为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政治羞辱用词的时候，有人自称“法西斯”究竟是什么意思？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法西斯疯狂追求军事化和工业化，能与生态有何干系？

但是了解法西斯历史的人，从中生态修辞中能一眼看出当今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的深层精神联系，同时牵带出生态学一段充满麻烦的历史。

法西斯主义的归来

2019年4月13日，奥地利维也纳，极右翼举着“身份主义运动”标识的旗子集会

事实上，这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恐怖分子是一场全球性的法西斯主义复兴运动的成员。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不是一张丑陋的标签，而是一种可取的思想。这场运动在美国被叫做“另类右翼”，在欧洲则有着与之对应的“身份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克赖斯特彻奇的恐怖分子与之过从甚密。在媒体上，这些新的民粹运动也经常被称为“极右翼”或“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二战后主导政治立场划分的线性的“左”和“右”已经不能够准确界定正在快速兴起的民粹政治。克赖斯特彻奇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宣言”中声称自己既是“左派”，又是“右派”，但同时又说这取决于左右的定义。

但是，他却明确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时的含义包括恢复某一种族或民族的尊严和优先性，反抗外来种族和思想破坏主体种族与其故土的天然联系，宣扬对祖国的崇拜，将社会军事化，歌颂斗争、英雄主义、领袖和男性气质。但是在二战后，它的固有含义渐渐剥落，“法西斯”经常被等同于“极端主义”和“暴政”，成为一个政治谴责和攻击的标签，参与议会选举政治的政党都不愿被打上这个标签，而新纳粹团体则都处于社会边缘。但是在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法西斯主义者开始蠢蠢欲动，想让这场运动重新混上历史的台面。

2017年8月11和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行的“联合右翼”集会，是对这种冲动的隆重宣示。这起事件更多地以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驶轿车冲入反对派游行队伍，造成一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及事后特朗普以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向白人至上主义阵营表示默许而被人们记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集会多么明目张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信条。

在8月11日晚的弗吉尼亚大学的“火炬游行”上，数百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挥舞着火炬列队进行，齐声高呼三句口号“你们不会替换我们”、“犹太人不会替换我们”、“血与土”。前两句，来自当前全球新法西斯主义者普遍信奉的阴谋论学说，认为白人人口将（在犹太人的策划下）被生育率过高的移民“大替换”。“大替换”论起源于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身份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之一Renaud Camus出版于2012年的同名书，也被新西兰恐怖分子用来命名他的“宣言”。而“血与土”是纳粹党的著名口号，指一个种族与一块领土有着天然的、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排他性联系。

这些集会者挥舞万字旗、行纳粹礼，有的还身着形似纳粹的制服，面对媒体或在他们自己撰写的“宣言”中，都毫不忌讳地自称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对他们来说，“法西斯”被污名化了，它是一场需要被重振的运动。

那么，法西斯主义者为什么要谈生态？简单地说，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强调种族与土地的天然联系，谈生态有助于强化这种联系，为消灭“入侵者”、淘汰不适者找到理由。

新西兰恐怖分子并不是这一轮法西斯运动中唯一谈论生态的。“另类右翼”（alt-right）一词的创造者 Richard Spencer 在 2017 年 8 月 11 日夏洛茨维尔集会首日发布的宣言《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是一份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纲领，强调白人的诸“欧洲民族”的整体性和优先性，敌视犹太人，强调人类社会受生物规律的支配、女性对民族负有生育责任，反对全球化以及“生意人和全球商人”的利益凌驾于工人和自然之上。在其 20 条纲领中，有一条题为“自然世界”，它写道：“我们是自然秩序中特殊的一部分，既在其中又在其上。我们既有能力成为自然的守护者，也可以成为它的毁灭者。放下像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这些争议性议题不谈，欧洲国家应当投资于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生产性和可持续性的农场和牧场。自然世界，以及我们对它的经验，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不知道写作者的背景和这背后的政治议程，这可以说是一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当中肯的反思，而且它并不否认气候变化，而是试图争取对它持不同看法的人对环境保护达成共识。

而在新西兰恐怖分子的宣言中，有一节是“绿色民族主义是仅有的真正的民族主义”。他在其中责备民族主义阵营长期听任左翼窃取环保议题，把环境破坏的终极原因归咎于不受控制的移民。他甚至不像 Spencer 那样搁置气候议题，而是承认是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只不过这个“人为因素”是人口过多。但他认为白人没有过度生育，过度生育的是那些被他称作“入侵者”的非白人移民，因此为了拯救环境，杀死后者是正当的（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碳足迹和资源消耗远低于富国中的白人）。他同时斥责“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什么都没能为保守（conserve）住”，他们丢掉的不止是国族、种族、宗教、文化，还有环境——“自然环境被工业化、碎片化和商品化了”，这名凶手写道。

但是，这两名极端主义者的思想都不具有什么原创性，而只不过是重拾了一场已经存在两百年的、推动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联姻。

生态法西斯往事

《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

由美国历史学者 Peter Staudenmaier 和作家 Janet Biehl 合著的《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Ecofascism: Lessons from the German Experience）出版于 1995 年，书中系统梳理了德国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它与纳粹运动的结合，及其二战之后的“现代化”过程，从 19 世纪上半叶一直写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书中将“血与土”这一神秘主义学说的起源追溯到两名 19 世纪学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和他的学生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 1823~1897）。

阿恩特是日耳曼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统一运动中重要的活动家，曾参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斗争。早在他 1815 年的文章《论对森林的照料和保育》（On the Care and Conservation of Forests）中，他就批评工业革命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认为自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草木、石头、虫子、人类，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分先后。而他的学生里尔在 1853 年发表的文章《田野和森林》中甚至提到了“荒野的权利”，令人不禁想起 2008 年厄瓜多尔左翼科雷亚政府将“自然的权利”（rights of nature）写入宪法。

但是，他们这些具有前瞻性的生态观却总是与排外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守护的自然，是“德国的”自然，要守护的土地，是“德国的”土地。与此同时，阿恩特反对混种生育、宣扬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同时鄙夷法国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而里尔则在《田野和森林》中写道：“我们必须保护森林，[.....]这样德国才会一直是德国的”。

里尔被人称作“乡村浪漫主义和反都市主义的奠基者”。他不仅批判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而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工业化、都市化乃至现代性本身。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后来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强有

力的“民族性运动”（*völkisch movement*）的核心要素，这场运动让生态神秘主义和种族主义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性运动”号召德国人“回到土地”，寻找某种人与土地源自太古的联系，它将时代的种种问题归罪于理性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都市文明。而无根漂泊的犹太人，是这场叫做“都市工业文明”的阴谋的幕后主使。

《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一书认为，生态学（*ecology*）的命名者和开创者、动物学家欧内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也贡献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形成。他的“一元论”

（*monism*）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没有形而上学的差别，而是受制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界。他也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在德语世界的重要传播者，但是他认为，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文明，优势种族有权主宰其他种族，他支持优生学、北欧种族优越论，反对人种混合。（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海克尔事实上对犹太人抱有积极看法，而他的思想后来也被纳粹党抛弃）。海克尔及其门徒 *Willibald Hentschel*、*Wilhelm Bölsche* 和 *Bruno Wille* 等，被认为强有力地塑造了此后德国的环境思想，这种思想把对自然保护的强烈关切与民族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

时间来到 20 世纪的最初 30 年，当时兴起的德国青年运动“游鸟”（*Wandervogel*）将以上思想付诸实践。它的名字来自于其成员经常结队在山野中长途跋涉，宣扬通过“回到自然”来获得个人自由，建立个人责任意识和纪律性。其思想混合了新浪漫主义、东方哲学和自然神秘主义，向往牢固的社群纽带和未被异化的社会关系，它敌视理性主义，认为是工具理性破坏了自然，造成了人的疏离。大部分“游鸟”成员后来被纳粹党吸收，把这些思想带入了纳粹党。

1933 年纳粹党上台，其中多名高级领导人具有这种试图重建人与自然联系的倾向。希特勒的确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他不仅素食，而且热爱动物，反对活体解剖，采用顺势疗法，甚至还谈论以水电和沼气替代煤炭，宣称“水力、风力和潮汐力是能源的未来之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呼应海克尔和一元论者的论调，认为人无法逃脱自然的铁律，他写道：“他们（试图摆脱自然铁律的人）反对自然的行动必然导致他们自己的垮台。”除了希特勒，《生态法西斯》一书指出，纳粹领导层中具有多神信仰

（*paganism*）的成员——包括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第三帝国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食品和农业部长理查德·沃尔特·达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无论是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在当代，神秘主义信仰与法西斯主义生态观之间的联系不断出现，这使得西方社会中将自然神秘化的生态观常被投以怀疑的眼光。这是后文将会谈到的话题。

《生态法西斯》一书还引用历史学家 *Klaus Bergmann* 的研究写道：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都或多或少地都倾向于乡村浪漫主义，敌视都市文化，认同一定程度的“再乡村化”的必要性。这种乡村浪漫主义伴随着对呵护自然环境的注重。希姆莱在 1942 年关于将波兰被占领土建设成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种族的农民自古以来精心呵护并提升土壤、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力量，并平衡整个自然界。”他认为，如果要让新占的“生存空间”变成日耳曼人的理想家园，那么尊重自然的规划是必须的，只有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才是最强种的。

而以达里为首的一批技术官僚，则热切地将生态意识形态落实为环境保护实践，他们被称作纳粹中的“绿翼”。

达里在 1930 年的一场演讲中说出一句“血与土的统一必须恢复”，正是这句话“血与土”变得著名，并在后来成为纳粹官方意识形态。达里还致力于将环保原则注入第三帝国的农业政策。他借鉴了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1925*）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和“生物动力农耕”（*bio-dynamic farming*）思想，创立了一套名为“生命规律农耕”（*lebensgesetzliche Landbauweise*）的有机农业方法。

他们还关心风景的民族性。装备和军火部长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在负责建设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时，曾要求这些公路能够“成为对周边风景之表现，和对德国本质的表现。”

纳粹绿翼的最大后台是纳粹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他的支持下，纳粹绿翼得以从 1933 年起推行了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生态立法，内容从森林复植到动物保护。1935 年的《帝国自然保护法》要求各级政府在开展对乡野造成重大影响的工程前必须咨询自然保护局，并限制对尚存荒野的商业开发。这些都被认为跻身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环保法规之列。30 年代中期，托特及其副手曾试图推行一部包罗万象的《帝国地球母亲保护法》，但最终由于经济部长以担心影响矿业为由反对而未能落地。

与此同步的是环保工作者中遍布政治积极分子。《生态法西斯》一书引用的一项对魏玛时期自然保护组织的调研显示：到1939年，这些组织中已有60%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而同时期，成年男性教师和律师加入纳粹党的比例仅为25%。

但是，并非所有的纳粹党高层都热衷生态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希特勒秘书鲍曼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海德里希就认为绿翼是一群不可靠的梦想家，或者干脆就是安全隐患。而最终，也正是由于绿翼的政治后台鲁道夫·赫斯在1941年独自飞往英国谈和，使这一派系走向瓦解。但是恶果已经结成，生态话语让原本温和的民众也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无根的外来民族被视为本土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的破坏者，这让大屠杀也具有了合理性。这一逻辑在新西兰清真寺的枪声中得到了恐怖的回响。

但是如今在西方和拉美国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环保是左翼的议题，而“右翼”、“保守派”则通常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污染的权利，把环保描绘为旨在阻碍经济发展、妨碍个人自由、乃至是推行集权统治的“社会主义阴谋”，有时甚至给环保主义者贴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但是，放到更大的历史尺度下来看，情况就不是这么两分。《生态法西斯》一书引用史学家的观点指出，对自然破坏的关切事实上来自各种意识形态背景，“生态学”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何种政治立场，而取决于对生态问题成因的解读。左翼——从福利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再到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环境问题，通常致力于分析造成破坏的社会关系，把矛头指向不受约束的工业资本（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而民族主义极右翼则认为自然破坏是因为自然秩序受到干扰，因此要保护环境就要肃清这些干扰因素——外来人口。

美国生态哲学家 Michael E. Zimmerman 在他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一种持久的诱惑》一文中还区分了当今美国语境下的“右翼”和“极右翼”。“极右翼”是前文已经讨论的类型，它藐视个人自由，而“右翼”（也叫“保守主义”）的实质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classical liberalism），他们崇尚个人自由、小政府，将环境保护和环境监管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些崇尚自由市场、资本友好的右翼对自然的无视态度恰恰是历史中的异类。在这个意义上，新西兰恐怖分子在他的“宣言”中指责保守主义者没能“保守”住自然，确实击中软肋。

可见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光谱并不连续，而是有着构造的不同。但是，两者在反对移民这一点上却经常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是后文会涉及的话题。

《生态法西斯》一书的作者特别指出，二战后德国的环境运动曾否认生态问题的政治性，绿党成员曾骄傲地声称自己“既不左翼也不右翼，而是在前峰”，这造成绿党被法西斯成分渗透（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绿党也都曾经驱逐内部的极右翼成分）。作者指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只有“生态”取向却没有社会批判意识，那么它将是十分不稳定的。而一种解放性的生态政治需要对古典生态法西斯主义及其当代延续性有敏锐的意识。书的下部就追踪了生态法西斯在二战后的遗族。

1993年8月14日，新纳粹组织在德国富尔达发起的“鲁道夫·赫斯游行”，聚集了上百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本土的激进新纳粹。

比如“国民革命者”（National Revolutionaries）运动声称试图弥合左右分野，走出一条基于民族主义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f the specific national way）的道路，相信这是德国对人类负有的使命。不能忘记，纳粹主义的全称正是“national socialism”。

其中一个叫“团结主义者”（Solidaristen）的派系追随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早期成员施特拉瑟（Strasser）兄弟的路线，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反对资本主义，甚至将后来被驱逐出党并流亡国外的弟弟奥托·施特拉瑟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同样挑战人们对意识形态界线的认知的，是它还支持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巴斯克、乌克兰、阿富汗乃至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政党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国民革命者”认为，二战后的德国是被帝国主义占领，试图解放它，并实现与奥地利的统一。

其主要的意识形态领袖激烈反对基督教，认为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宗教”，被对生产力的崇尚所绑架。而为了培养出一种国族认同，就需要创造一种结合了日耳曼新多神论（neo-pagan）信仰、凯尔特和印度宗教与“völkisch”民族主义理念，以仪式、舞蹈和禁忌、冥想和狂喜为基础的新宗教。从而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克服异化，重新发现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革命者”运动不只是利用生态修辞构建民族主义，他们也确实参与了环保运动。比如，他们在70年代投身反核能运动；70年代末部分成员加入了新生的绿党，甚至担任了职务，直到在1980年被认为过分危险而遭到驱逐。

又比如成立于1979年、1995年被宪法法院裁定为非法的自由德国工人党（**Freiheitli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它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赞美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要求将就业机会留给德国人、遣返外国人、不给外国人特许经营权，反对社会融合。他们还试图重建纳粹党并团结各路法西斯主义者。作为希特勒而非施特拉瑟兄弟的信徒，他们不寻求与左翼的和解，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督教一起视作“撕裂人类与我们的地球的自然周期的联系”的罪魁祸首。他们反对堕胎、支持动物福利，认为“技术环保主义”不能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灾难，而是需要发动一场“生态革命”和“意识革命”，将人类重新整合到“地球生命结构”中去。

还有创立于1983年的“共和党人”（**Die Republikaner**），自称为“德国爱国者的社群”，否认与纳粹的联系，但是其政纲却带有“血与土”的印记。他们反对移民、主张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要求保护德国种族健康，反对德国妇女堕胎——但是，他们却认为第三世界限制生育是必须的，以防“人口爆炸”危害环境。

《生态法西斯》一书的记录止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到2012年，媒体报道了由前纳粹党员创立于1964年的国家民主党（**NPD**）开始出版一本有机农业杂志来宣传极右翼思想。报道同时揭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家民主党的支持下，持极右翼政见的人口陆续迁往德国东北风景如画但人口凋零的前东德农业地区梅克伦堡（**Mecklenburg**）定居耕作，试图恢复纳粹时期的“血与土”农业浪漫主义运动“农人联盟”（**Artamanen-Gesellschaft**）。他们提倡有机农法、呵护土壤、反对工业化的动物养殖、转基因种子和化学杀虫剂，其不仅出于保护环境，也出于反对资本控制农业、为农民和农产品消费者争取权利的主张与左翼环保运动一致。

这些“殊途同归”，让关于生态法西斯的讨论变得更加麻烦。一种环境和农业主张既可以是“绿色”，也可以是“褐色”（纳粹冲锋队制服的颜色），若不加分辨容易误入歧途。

不应有的误解

读到这里，可能已经有人欣喜不已，以为找到了唾弃有机农业的新证据，迫不及待要给它打上一张法西斯的标签，让它永远失去挑战他们崇拜的“农业现代化”的资格。

但事实会让他们失望。有机农业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一方面出于朴素的对农业现代化的环境破坏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有一个鲜明的反垄断立场，与法西斯主义并无必然联系。所谓“有机”是农业与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现代有机农业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之一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t Howard**）发现，一战后源自炸药过剩产能的氮肥泛滥，严重破坏农田土壤，因此提倡以有机质堆肥还田取代氮肥，以保存地力。他在1940年的著作《农业证词》（**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中，将土壤称作一个国家真实而永恒的资本，既创造生产力，也需要经营维护。在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和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它反对现代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生产化肥、长距离运输等），进而反对掌握化石能源的“军队-企业复合体”。在第三世界，巴西的生态农业（**agroecology**）运动旨在回应该国外向型种植园经济对农民的剥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业运动（不同的地方标准不同，名称也不同，但基本观念一致，这里只是泛称，也可以叫做“生态农业运动”、“可持续农业运动”）还都强调维护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反对整齐划一的商业化种子抹杀由千百年的选育种换来本土品种抗逆性及其品种的丰富性。

有机农业运动根本的诉求是生态环境保护和食物经济的民主化，被商业劫持而异化的伪有机，则另当别论。作家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两难》中曾对这些被他称作“大有机”的有名无实者进行过批判。

源自鲁道夫·斯坦纳人智学思想的生物动力农耕（**biodynamic agriculture**）是最早的有机农业运动之一，前文提到它曾启发过纳粹农业部长达里。如今，生物动力农耕在德国有机农业界依然占有极高比重，它在强调呵护土壤肥力、善待牲畜、遵守耕作时令的同时包括一些玄奥成分，是一套不科学但能有效规范生态实践的知识体系。斯坦纳人智学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一直为人诟病。2002年，生物动力学农耕的认证机构德米特国际在其章程中禁止了参加种族主义组织或与之合作者的加入。当今的德米特成员，绝大多数都区别对待斯坦纳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生物动力农耕积极的生态观，其中包括笔者曾经访问的左翼无政府主义青年农业公社成员。

新的可持续农业运动也有意识地拒绝法西斯主义的渗透。德国在 2011 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的运动，名为“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它集结了从左翼环保团体，到普通家庭农场主，到基督教会各路社会力量反对工业化农业污染环境、损害农民和消费者利益、虐待动物，每年 1 月在柏林举行大规模游行，与推广工业化农业的柏林国际绿色周唱对台戏。被问及生态法西斯的问题，其成员告诉我这的确是个问题，所以每年的论坛上都讨论“绿中之褐”的话题，他同时给我看示威海报上的一行小字：“我们不欢迎纳粹和种族主义者。”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40011

生态法西斯主义（下）：面对仇恨政治与生态崩溃的双重危机

蒋亦凡

2019-05-30 15:55

来源：澎湃新闻

· 思想市场 >

字号

生态法西斯主义（上）：法西斯的生态往事，生态学的麻烦历史

按：近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气候和环境议题占据了选战的焦点。选举前的民调显示，气候与环保议题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安全与移民问题，成为了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这被认为是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流失选票而德国绿党一路飙升成为最大赢家的原因。不过生态问题并不向来是左翼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从最近发生的新西兰清真寺恐袭案凶手 Brenton Tarrant 发表的宣言《大替换》，到两年前“另类右翼”一词的缔造者、白人至上主义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维尔“联合右翼”集会期间发布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寻到生态议题的线索。事实上，生态学在二十世纪就有着一段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的历史，它在法西斯主义“血与土”的逻辑下，成为了反移民的帮凶——普通民众在生态话语的鼓励下，开始相信无根的外来民族（犹太人）会破坏本土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而“生态法西斯主义”也并未随着纳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续回响在后来的很多运动之中。

今天，西方政治光谱中的极右翼也经常调用生态议题作为其反对难民的工具，那些在资本全球化流动中越来越边缘的西方底层，将其对现代性和建制的不满，发泄于涌入欧洲的难民潮——“生态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这种转嫁的重要入口。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生态系统的的确确在崩溃。如何避免这一切身的危机生发出仇恨政治，也许是政治生态学在今天要回应的重要问题。如本文作者蒋亦凡提示到：我们需要双重警醒的政治生态学——它需要既能为应对生态灾难提供思想能量与知识工具，同时从生态法西斯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也是为了积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回潮。

炸弹客和键盘侠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另类右翼找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政治气候，蠢蠢欲动。其中的“生态法西斯”倾向也逐渐落入媒体的视野。

英国时政杂志《新政治家》在 2018 年 9 月刊登了 Sarah Manavis 的报道《生态法西斯：一种环保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联姻的意识形态正在网上滋生》，描绘了生态法西斯在英语世界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的面貌。

在 Twitter、tumblr 上，这些新法西斯不断地宣扬厌恶非白人，尤其敌视犹太人，赞颂希特勒，否认大屠杀，认为白人已经成为犹太人策划的全球主义多元文化的奴隶，引用纳粹的“血与土”和“生存空间”（lebensraum）论述，向往成立只有白人的种族国家。与此同时，他们也抨击环境破坏、虐待动物，批评工业化和城市化，向往返璞归真、重返自然。他们也钟情于北欧前基督教的多神信仰，即北欧神话，赞颂雷神托尔、日神索尔，庆祝战神蒂尔之日（周二）。这个群体具有一系列视觉特征。他们的发帖中经常包括田园、森林、山谷的画面，他们的昵称中经常出现松树的图标，以及日耳曼语族在采用拉丁字母之前使用的如尼字母（runes），尤其是代表“生命”的奥吉兹“Y”或“𐌿”。对松树的偏爱，让这些人有了一个诨号——“松树帮”（pine tree gang）。

《追缉炸弹客》海报

《连线》杂志在同年8月发表的 Jake Hanrahan 的报道，则花了半年时间接近松树帮成员，展现了网络上“绿色边缘政治”与新法西斯合流的过程。作者发现它的起点，竟是一部2017年8月上映的美剧《追缉炸弹客》（*Manhunt: Unabomber*）。电视剧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是与现代技术为敌的连环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卡钦斯基据说才智过人，在1967年25岁时就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史上最年轻的助理教授。1978年，卡钦斯基开始制作并投放邮件炸弹，目标是他眼中的现代科技鼓吹者和象征——大学教授、行政人员、研究人员、学生，以及电脑商店业主、航空公司行政人员乃至民航班机。在他18年后被捕的时候，他的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在他逍遥法外的这些年里，他隐居在蒙大拿深山中，1995年媒体收到了他撰写的一份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表明他制造这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目的是反对现代技术造成人的异化和环境破坏。他甚至预言，现代技术的逻辑延伸必然是基因工程对人的普遍改造，而且这种改造是为了使人适应技术工业社会，而非使社会适应人的需求。

电视剧对卡钦斯基采取了同情态度。剧中卡钦斯基被捕后，负责此案的探员出于对他的认同，搬进了深山的小木屋。《连线》报道指出卡钦斯基虽然反社会，但是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他支持激进黑人解放团体），而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新卢德主义”。通过网剧和社交媒体，它吸引了一批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年轻人，他们感到现代生活碾压个人精神、削弱社区凝聚力，开始敌视主流政治正确，梦想摧毁建制乃至整个现代文明。卡钦斯基和他在蒙大拿山中躲藏的小木屋的形象被松树帮在社交媒体频繁张贴。去年，松树帮还共同为狱中的卡钦斯基（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送上了一张数字生日贺卡。

起初这些反建制、反现代性的情绪并不包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成分，但是法西斯主义元素渗入，其路径正是“生态法西斯”，对浪漫化的纯净自然的执迷合理化了对外来人口的敌视。对真正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已经积重难返，主流环保运动也只不过是“系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带来改变。对环境灾难和移民潮的恐慌让他们想象战争即将到来，在发布的内容中充满了战争图像，但通常不是正规军战争，而是与政府军作战的爱尔兰共和军、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乌克兰顿巴斯分离主义武装等准军事组织。但这也不都是出于焦虑，它也来自厌倦。报道中有受访者说渴望有什么东西值得自己为之而死，而战争看起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士兵

不过，虽然美剧扩大了卡钦斯基的知名度，但是极右翼分子对他的追捧或劫持却早已经开始。至少，在2011年杀死77人的挪威恐怖分子 Anders Breivik 的“宣言”中，就大量抄袭了卡钦斯基的宣言。

这些缺乏政治活动空间的另类右翼分子花费大量的时间聚集在匿名贴图板 4chan、8chan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不知疲劳地劫持佩佩蛙、辛普森等大众文化图像制作表情包（meme）恶搞他们眼中的敌人，从希拉里·克林顿到与意见相左的其他网民；或者用外人难以理解的暗语、符号或无厘头游戏互相识别、确立社群边界；或者，仅仅为了淹没为他们不喜的内容。

这种行为被称作“贴屎”（shitposting），看上去不起眼却是另类右翼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有评论者认为贴屎就像一战前夕兴起的达达主义艺术，宣泄对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的厌恶——“屎一样的世界只配得上屎一样的艺术”。而眼下的时代处在和当年同样的动荡中，贴屎者拒绝与他们眼中的“系统”对话，用一种低劣混乱蒙昧的语言对世界表达深深的恶意，并用这种方式来组织和动员。有人说，新西兰恐怖分子对袭击的精心包装和传播，本身就是一场现实版的贴屎。

民粹政治模糊着左右的界线，另类右翼理论家、特朗普的“戒灵”史蒂夫·班农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上为“民粹”辩护说：“民粹是关于小人物的发言权”。确实，这些另类右翼小人物很难与主流右翼分享同样的世界观，他们没有从后者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全球化经济中受益，反倒普遍比父辈贫穷、更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更缺少生活的选择。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在一篇关于崇拜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支持有机农业的欧洲新保守主义者的文章中所说，当今主流的右翼没有自洽的世界观，他们推崇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势必引起人口的流动，但是他们却恰恰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另类右翼虽然危险，但是在反对全球化这一点上，确实比主流右翼自洽，既反对人口流动，也反对资本流动。（当然他们也有不自洽的地方，比如既然谈“血与土”，自然是应该把北美还给印第安人）。

马尔萨斯的门徒

无法自洽的主流右翼中有时也披上环保的外衣，把反移民的立场推向极端。美国环保团体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旗下杂志 *Onearth* 在 2002 年发表的报道《当仇恨变绿》揭露了反移民团体“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承载力网络”、“人口-环境平衡”等组织如何以环保为借口反对移民。在他们看来，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多种环境问题，尤其是都市扩张——即便并无证据支持。他们甚至提出，由于绝大多数移民在他们母国所消耗的资源远小于美国消费者，因此应该禁止他们来到美国以免增加他们的资源消耗，却不认为美国人的高消耗是个问题。报道指出，拿环境问题说事是笼络政治观点温和、不愿直接反对移民的人群的手段。

2016 年 11 月特朗普胜选之后，FAIR 迅速呈上了一份“移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剥夺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但事实上，在特朗普就任之前他的移民政策顾问中就有 FAIR 成员。FAIR 还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合作，从有纳粹背景的优生学机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获得资金。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

FAIR 董事会上有个名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他 1968 年的著名论文《公地悲剧》的著名结论被不断用来鼓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但哈丁及其附和者不明白，人其实聪明到懂得合作起来订立制度对公地使用进行管理，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1974 年，他的另一篇寓言体文章《救生船伦理》道理同样粗糙。他假设地球是一艘因为资源耗竭正在下沉的轮船，把富裕国家比作救生船，坐满了本国人口，在水里挣扎的是穷国人口，他说这时如果搭救落水者，势必导致救生船倾覆，是富是穷都同归于尽，因此正确的伦理是抛弃落水者。文章的现实背景是当时富国正准备向穷国提供食品援助，但在他看来这么做没有好处。只有让穷国自己面对饥荒才能迫使它们主动提升农业生产力，并控制人口规模。哈丁在文中还反复强调穷国的生育率数倍于富国，认为这个趋势不太可能改变，因此一旦给他们“救生船”空间，只会让船翻得更快。所以在他看来，务实的态度是：不给穷国援助，也不让他们移民，听任饥荒去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哈丁不明白，寓言体的好处是容易灌输道理，坏处是一旦用错比喻就一错到底。“救生船伦理”具有某种合理性是因为人的体重和体积是彼此接近且相对稳定的，但现实中，富国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数倍于穷国，而穷国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递减也已是常见规律。如果哈丁对救生船伦理是认真的，那么至少应该评估消耗资源多的富国人和生育率高的穷国人谁更适合留在救生船上，同时设法让富国减少资源消耗，帮穷国发展经济，使双方得以共存。

哈丁表面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现实主义掩盖的，是强烈的本土优先意识和对穷国和来自穷国的移民的深深歧视，其中甚至散发出种族主义的气味。在这一点上，他和两百年前的马尔萨斯若合符节，后者的人口论认为穷人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饥荒，由于穷人人口增长是危险的事情，因此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因有助于控制人口而具有了合理性，这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对平民有权使用的传统公地的圈占。在这一点上，《公地悲剧》的作者和马尔萨斯再次遥相呼应。

这些反移民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都在为同一套仇恨话语添砖加瓦，为法西斯的崛起培育土壤。

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还有另一群人也认为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不把责任塞给穷人和移民，而将整个人类都看作问题。这些人被称为深层生态主义者（deep ecologist）。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支持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类无权过度干预自然，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应该大规模减少的恰恰是人口。他们认为，要扭转走向生态危机的命运，必须颠覆源自启蒙运动的社会文化根基，反对将人与自然两分，反对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试图从海德格尔哲学、东方宗教与哲学中寻找启发，实现一场人类社会的精神变革。

Earth First! 组织合影。图片来源：justseeds.org

在现实中，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采用激进的行动主义。美国成立于 1980 年的激进环保团体“地球优先！”（Earth First!）的成员曾试图破坏多座美国核电站；绿色和平的联合创始人 Paul Watson 由于不接受其他成员的非暴力原则在 1977 年被开除，他此后成立了“海洋牧羊人自然保护会”，驾驶船只使用海盗手法袭击实施捕鲸、捕海狮、使用流刺网的“盗猎者”。该机构被多国政府认定为“生态恐怖主义”；另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对现实抱深度悲观态度，比如当左翼认为要解决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人类已经拥有了一切所需要的技术，关键是促使被既得利益绑架的政府采取行动。而深层生态主义者则怀疑这些技术是否还能解决问题，认为唯有大幅降低人口和生产力、停止经济增长才是出路。而实现这些的唯一可能，似乎仅在于诉诸极权主义政府。

有人把深层生态学视为在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面前，对陷于僵化无力、自欺乃至共谋的环保运动的深刻反思。但是它的反人本主义、反现代性与工业社会的倾向，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性色彩，则让人发现它与当年德国的“游鸟”运动的共同点。还有人把深层生态主义者比作英国上世纪 20、30 年代一批倒向法西斯主义的自然作家，他们赞颂和哀悼乡村与自然的黑色文本背后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憎恶。其中的 Henry Williamson 写于 1927 年的乡村故事《水獭塔卡》在 2018 年仍是“英国最受欢迎的自然书籍”，但作者在 1937 年加入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

事实上，前文大量引用的 Peter Staudenmaier 和 Janet Biehl 的《生态法西斯》一书就经常急于将深层生态学 and 法西斯主义划上等号。两人在思想上都追随美国社会理论家、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奠基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 1921~2006），而布克钦正是一名深层生态学的尖锐（抑或尖刻）批评者。

布克钦早在 1987 年就写过一篇辛辣的《社会生态学对深层生态学：对生态运动的一项挑战》，对深层生态学发起全面进攻。他对深层生态学主要的不满是认为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抹消了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别，在批判“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同时，放弃了对造成这种破坏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他一手高举理性主义旗帜，认为自然是自然演化的成果，并非来自神祇的意志，反对神秘主义和自然崇拜；另一手高举“文艺复兴全盛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大旗，认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这让人类有资格置身于生物界之上，去干预它，“去有意识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世界的）磨难，进一步推动具有生态价值的新物种的演化”。

在布克钦看来，深层生态学用一种虚假的激进性削弱了生态学应有的社会批判锋芒，它因为对人口控制的执迷而落入了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被用来支持对贫弱者的残酷。布克钦当时就给深层生态学戴上了“生态法西斯”的帽子。

布克钦自己的“社会生态学”吸收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建立一种去中心化、非科层制、提倡地方自治与互助的社会，布克钦认为唯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应对生态危机。这套思想被称作“自由地方自治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它在现实中被付诸实践。

游行人们挥舞带有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的旗子

新世纪初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 1947~）在土耳其监狱中读到布克钦的著作，深受影响。他把库工党纲领从原先的马列主义转型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不仅把寻求建立库尔德民族国家的目标改为追求地方自治，而且试图在其中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直接民主，以及一个世俗的、性别和民族平等的、保护生态系统的社会。其生态成就或尚且有待证明，但是在 2012 年以来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村社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这种组织形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网上广为传播的着迷彩服、扎大粗辫、扛枪打 ISIS 的库尔德女民兵就是来自那里。

不过，深层生态主义者并不接受布克钦的批评，更不接受“生态法西斯”的帽子。他们认为，平等的社会无疑是好的，但是它对自然依然是剥削性的，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中一个叫做“左翼生物中心主义”（Left Biocentrism）的阵营反对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关注社会公正，支持财富的再分配，但同时也不认为人凌驾于生物界之上，主张人类社会开展一场“内在变革”，使之能够把各物种的利益放在一己私利之上。这让人想起在本世纪之初南美一批左翼政府上台，试图利用国内油气、矿产资源来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的利益，但是其采掘导致环境破坏和原住民背井离乡，政府还对抗议者实施迫害。这让原住民开始采用“帕查妈妈”（Pachamama，意为大地母亲）神话来强调自然界的权利并开展组织动员，与左翼政府的“采掘主义”斗争。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人文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究竟谁更能引发富有意义的文化变革和政治行动？这个争论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出不同的答案。而我们正在面对前人从未面对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愈演愈烈，人类可能只剩十几年来控制它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同样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还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100 万种动植物正处在灭绝的边缘，而这又与气候变化互相加强，形成一个恐怖的恶性循环。面对这些，国家政府却普遍出奇缺乏政治意愿去积极应对，甚至干脆否认危机的存在。

在刚刚过去的欧盟选举中，气候危机的严峻形势和年轻选民的政治觉醒让欧洲绿党而获得重大胜利，进入政治主流。这是个好消息，不过也有一个坏消息——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这场选举中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士气高昂。这就是世界面临的双重危机——生态灾难与仇恨政治的卷土重来——因此需要双重警醒的政治生态学。它需要既能为应对生态灾难提供思想能量与知识工具，同时从生态法西斯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也是为了积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回潮。

生机勃勃的新的生态政治正在涌现。从进步政治家及其选民试图以强力国家干预来实现能源转型与经济公平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s**），到公民因为对议会和选举政治回应生态危机的能力深感幻灭而诉诸非暴力抗争与直接民主的“灭绝起义”（**Extinction Rebellion**），再到孩子们向成年人要求可指望的未来的“气候罢课”。更成熟、更深刻、更能回应当今常常令人困惑的现实的生态思想，或许就将从中诞生。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40012